

丁
玲

DING LING
WENXUE BIANJI HUODONG
YANJIU

文学编辑活动 研究

黄蓉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回顾了丁玲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主编五种重要的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红黑》《北斗》《解放日报·文艺》《文艺报》和《中国》的文学编辑生涯，展现了丁玲从一个崇尚自由、个性的女作家到加入左联，选择革命来到延安，并成长为具有多重文化身份（作者/编者/革命者）的党的文艺作品“把关人”的曲折过程，以及其不同时期的文学观、编辑观和对中国文艺发展的思考与探索，创新与贡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黄蓉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22.6

ISBN 978-7-5667-1954-6

I. ①丁… II. ①黄… III. ①丁玲（1904—1986）—人物研究 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 ③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07111号

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

DING LING WENXUE BIANJI HUODONG YANJIU

著 者：黄 蓉

责任编辑：全 健

印 装：长沙创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39千字

版 次：2022年6月第1版

印 次：202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7-1954-6

定 价：58.00 元

出 版 人：李文邦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1691（营销部）

88821594（编辑部）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营销部联系

绪论	001
<hr/>	
第一章	坚守《红黑》：在边缘处唱自己的歌 ——丁玲 20 世纪 20 年代文学编辑活动
<hr/>	
第一节	副刊杂志与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新文学权力场的构成 013
第二节	从《红与黑》副刊到《红黑》月刊 017
第三节	《红黑》月刊的运作及其人员聚散 023
第四节	丁玲早期文学编辑活动的个性特点 035
<hr/>	
第二章	主编《北斗》：从“同路人”到“螺丝钉” ——丁玲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编辑活动
<hr/>	
第一节	明星的诞生——左联对《北斗》主编丁玲的选择及宣传 044
第二节	《北斗》对左联机关刊物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059
第三节	丁玲对《北斗》主编身份的自我认知 082

<hr/>	
第 三 章	着眼《解放》：未完成的可贵探索 ——丁玲 20 世纪 40 年代文学编辑活动
<hr/>	
	第一节 文艺整风前后延安文人生存环境及党的文化政策 097
	第二节 丁玲与《解放日报·文艺》的可贵探索 117
	第三节 丁玲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对延安文学的影响 127
<hr/>	
第 四 章	执掌《文艺报》：被抑制的激情 ——丁玲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编辑活动
<hr/>	
	第一节 “文艺新方向”的确定与建国初期文艺期刊体制的建构 134
	第二节 丁玲主编时期《文艺报》稿约变迁与栏目兴衰 142
	第三节 丁玲对萧也牧的批判 ——《文艺报》与建国初期群众批判模式 153
	第四节 中央文学研究所与《文艺报》 165
<hr/>	
第 五 章	领军《中国》：阴影下的最后辉煌 ——丁玲晚年文学编辑活动
<hr/>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建构与期刊环境 172
	第二节 晚年丁玲与《中国》 186
	第三节 晚年丁玲的“辩诬情结” 198
<hr/>	
结 语	203
参 考 文 献	211

绪 论



丁玲以她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艰难的艺术探索旅程，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启示和深沉的思考。正因如此，丁玲研究自新时期以来便一直是热点，近年来更随着一些新材料的抛出不断招来是非，在整个知识界掀起巨大的震动。在笔者看来，一个内涵丰厚的研究对象宛若“蒙娜丽莎的微笑”，令研究者浸淫回味，能不断咀嚼出新意。丁玲研究的魅力亦在于此。无论外界对丁玲其人其作如何褒贬毁誉，都不能改变一个不争的事实：横跨六十年风风雨雨、硕果累累的文学编辑活动作为丁玲个体生命一个重要的实践行为，正静静地呈现在那里，吸引着研究者去接近它、领悟它，并在此之上去敞开心内在具有的种种奥秘。

一、新时期以来丁玲研究的简单回顾

1979年至2019年40年间，新时期的丁玲研究在总体发展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至1986年丁玲逝世前的八年，旨在拨乱反正。当时丁玲研究的主体任务是破除22年来对丁玲形象的歪曲与亵渎，把对丁玲的理解和认识，回归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丁玲研究的正确结论上来。这时丁玲研究在方法论上已从社会政治分析转换到文学史整体考察，即注意将丁玲置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广阔背景中，把她与同时代作家、中国文化以及20世纪文艺思潮的研究结合起来。袁良骏、严家炎对丁玲素有争议的小说创作之再解读代表了这一时期丁玲研究的最高水平。1980年，袁良骏的《褒贬毁誉之间——谈谈〈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文的发表，为丁玲创作的拨乱反正的再评价发出了可贵的第一声。袁文不仅逐一驳倒了多年来那些诬蔑莎菲的不实之词，而且以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指出莎菲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莎菲形象不仅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且是一个‘市侩’灵魂的惩罚者”^[1]。这就使人们对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学术

[1] 袁良骏. 褒贬毁誉之间：谈谈《莎菲女士的日记》[G]//袁良骏. 丁玲研究资料.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475.

价值的认识，不仅恢复到30年代茅盾认为莎菲是个“旧礼教叛逆者”的新女性的观点上，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对《日记》再评价的同时，学术界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过去有争议的作品也进行了再评价。这些评论多以犀利泼辣的笔墨、新的观念和新历史视野勇猛冲破“左”倾思想的樊篱，对丁玲过去颇有争议的作品之美学价值进行重新评价。其中以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在医院中〉》一文最为引人注目。严文认为：“《在医院中》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写出了小生产者思想习气的危害，还进一步深入地写出了同这种思想习气作斗争是何等困难。”谈到《在医院中》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时，严文则认为它是中国干预生活文学的“先驱”，“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从丁玲逝世到1997年。这一阶段围绕丁玲创作道路与文学创作的成败，丁玲与当代文坛，与周扬、沈从文的恩怨纠葛，袁良骏、王蒙抛出的“丁玲晚年”现象争论，徐庆全与张永泉等关于周扬与丁玲晚年“辩诬”心态的论争，使丁玲研究似乎陷入到了丁玲人格、人品简单臧否的二元论思维泥淖，而关于丁玲艺术创作的深入研究则被搁置一旁。

关于丁玲创作道路与文学创作成败之争，1987年，严家炎在《文学评论》中发表《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1]，对丁玲创作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会点上，科学而客观地评价。他认为“丁玲的早期小说不但在意识内容上属于现代，而且在艺术思想、审美要求上也地道地属于现代”。指出其早期小说的独特处在于：“作者不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而且以她强烈的现代意识”，深沉地感受了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痛苦，“并通过较成功的典型形象深切、真挚地表现了这种痛苦”。进而指出：“在写出20年代前期知识女性面临的痛苦这一点上，丁玲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如此深刻地去理解丁玲早期小说中塑造知识女性内心痛苦的独特的美学成就，标志着丁玲研究已经站在时代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历史而发出具有理论深度的科学阐述。严家炎的《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清晰地勾勒出了丁玲创作发展的轨迹，从而肯定了丁玲在新文学史上的

[1] 严家炎. 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J]. 文学评论, 1987(04): 83.

位置。然而在严文发表一年之后，王雪瑛在《上海文论》上发表《论丁玲的小说创作》，尽管没有针对严文展开任何正面的交锋，但她对丁玲创作发展轨迹的评价，与严文是相左的，这在丁玲研究界引起不小的震动。王雪瑛认为丁玲创作《日记》时，是用自己的整个身心来体认和塑造人物的，肯定丁玲的创作不但给文坛留下了一批生动的女性肖像，更获得了一次自我超越的机会，显示了自己那种大胆而率真的性格魅力。但作者认为丁玲《日记》之后的创作，从《韦护》开始，便走上了失败之路，只有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的创作中，“她的自我仍然顽强地要在笔下世界中露面”，才显示了艺术个性的生命力。其结论是到丁玲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人们已“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那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作为《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独特禀赋”。“她的创作变了质，由先前那种积极的自我超越，变成了自我丧失，变成了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1]根据这样的归纳，丁玲的创作道路变成了一条失败的轨迹。这和严家炎认为的丁玲的创作道路是追随鲁迅的杰出“开拓者”的轨迹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

关于“丁玲与当代文坛”的论争：1993年春，在湖南桃花源举办的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上，袁良骏突然对丁玲其人其文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他认为：“丁玲复出后，……愈来愈让人们失望：她的血泪控诉以《牛棚小品》始，几乎也以《牛棚小品》终……剩下的仅有怀人忆旧和歌功颂德了！”进而指出：“丁玲的晚年，与早年的丁玲、延安的丁玲判若两人，她的棱角、锋芒、勇气统统不见了，她变成了一个十分平庸的歌功颂德者，不，极左路线的维护者、辩护士！”^[2]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与王雪瑛认为的丁玲后期的创作，“由先前的那种积极的自我超越，变成了自我丧失，变成了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一致。

袁良骏的文章在学术界造成的震动刚刚沉静下来，王蒙于1997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我心目中的丁玲》。该文的发表，更引起了人们的震惊。王蒙对丁玲其人其文提出全面质疑。他说：“丁玲是国内外如此声名赫赫，……因为她的一生是

[1] 王雪瑛. 论丁玲的小说创作 [J]. 上海文论, 1988 (05).

[2] 袁良骏. 丁玲和女权主义漫议 [C] // 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编选小组.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 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4: 280.

如此政治化，她面对过去和至今（死后）仍需面对的问题是如此尖锐，因为她与文坛的那么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并说丁玲“是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说得露骨一点，她有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认为正因此复出后的丁玲才不甘寂寞，将新时期的青年作家看作自己“竞争的对手”，晚年她公开提出“作家是政治化的人”，从而陷入80年代文艺界各种思想争鸣的旋涡里。而她又“视自己的革命者的身份高于一切的宝贵”，从而“盛气凌人炫耀自己的革命与傲视别人的不革命”。凡此种种，在王蒙眼中，丁玲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但另一方面，王蒙又高度肯定了丁玲的艺术才华。他认为：“丁玲是那一辈里最有艺术才华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她写的女性，真是让人牵肠挂肚，翻瓶倒罐。丁玲笔下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她写得太强烈、太厉害，好话坏话都那么到位。”认为“她的一生被伤害过也伤害过别人……但主要是被伤害过”。^[1]

王蒙的文章引起了丁玲亲人与学术界的关注。陈明、周良沛等著文加以反驳，以自己亲眼见到的中青年作家张贤亮、白桦包括王蒙在内前进路上受到挫折时，丁玲对他们的扶植与关怀，来说明丁玲并不是王蒙所说的“政治化”了的作家。^[2]实际上，在这次争论中，不论是王蒙，还是陈明、周良沛等人的文章，都拘泥于丁玲的人品，而对丁玲创作成败得失的论争，涉足不深，争鸣并未从学理角度将丁玲研究引向真正的深入。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至今。女性主义文学、文化研究、政治学、大众传播学、语言学等理论纷纷融入丁玲研究领域，为丁玲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丁玲研究的史料发掘整理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1998年“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研讨会”上，不少研究者围绕“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丁玲女性小说的特色与贡献”等中心课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同时对丁玲创作中的“女权主义思想”“女性解放之路的探求”等发表了精湛的见解。有的学者从女性文学角度将丁玲和张爱玲在40年代创作中对女性命运的思索作了比较研究；有的学者则从“丁玲创作‘性

[1] 王蒙. 我心目中的丁玲 [J]. 读书, 1997 (02): 88-96.

[2] 陈明. 事实与传说 [J]. 作品与争鸣, 1997 (12); 周良沛. 重读丁玲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7 (04).

爱’描写的美学价值及深层次文化心态来揭示丁玲小说独特的美学追求”^[1]。研究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视野和角度，拓展了丁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进入 21 世纪，丁玲研究史料发掘、整理工作都有了突破性进展。邢小群著《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2]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侧重从体制文化的角度看丁玲。她选择中央文学研究所这一角度看丁玲，关注一种制度如何形成对作家的制约，将丁玲研究从过去的文本研究拓展到外部研究，标志着丁玲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全新的突破与转变。另外随着徐刚、徐光耀披露的 20 世纪 50 年代初记载丁玲文学活动的史料^[3]，王增如对丁玲 80 年代“清污”运动的辩诬以及丁玲晚年创办《中国》的内幕材料^[4]，徐庆全、徐光耀等知情人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内幕的争论^[5]，颜雄先生就《北斗》杂志方方面面访谈丁玲的重要材料的纷纷“出土”^[6]，一个对文学有独特理解而被扭曲的知识分子丁玲，就从历史、政治与人际纠葛的迷雾中逐渐浮现出其本来面目。

至于目前学界对丁玲的文学编辑活动的研究，无论是材料的发掘、梳理还是相关个案理论研究，均有比较广阔的开掘空间。由于丁玲的文学编辑活动时间跨度大，所涉及的副刊杂志又大部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且必须紧紧依托其植根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期刊文化土壤，“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的人、事、关系非常庞杂而零散，不少材料因涉及敏感禁区不便披露，因此现阶段的工作主要放在对第一手原始材料整体性的发掘、系统清理等基础性工作上。尽管现有的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的史料大都是片段性的，非常零碎，但也是弥足珍贵的，这里主要是指丁玲各个特定时期所编副刊杂志的原始文本材料及相关传记资料，包括当事人书

[1] 《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编选小组. 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研讨会文集 [C].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2] 邢小群. 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 [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3] 徐刚，邢小群. 丁玲和中央文学研究所；徐光耀. 丁玲的两篇遗作 [J]. 新文学史料，2000（04）.

[4] 王增如. 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 [M].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22；王增如. 从一封短筒说起：我看丁玲编《中国》 [J]. 新文学史料，2004（03）.

[5] 徐庆全.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徐光耀. 昨夜西风凋碧树：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 [M] // 金蔷薇. 作家人生档案：上.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

[6] 颜雄. 丁玲说《北斗》 [J]. 新文学史料，2004（03）.

信、日记、回忆录。其中，较早强调丁玲文学编辑活动重要意义的是原《解放日报》编辑黎辛先生，在其多篇有关延安文事及《解放日报》的回忆性文字中，他都申明了丁玲作为“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人”对延安文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1]牛汉先生关于《中国》的访谈对研究晚年丁玲的编辑思想与编刊策略极为重要，他引导人们透过层层“伪”看到晚年丁玲灵魂的“真”。^[2]

同时，由于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起步较晚，学界现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停留在对其特定时期的编辑思想及个性印象式的粗浅描述层面上，而且即使是这样的成果也属难得。1995—1998年，学界开始有人提及作家丁玲的“编辑”身份，着重从编辑学的角度加以探讨。^[3]丁玲研究界正式提出丁玲作为“编辑家”独立存在始于1999年第八届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率先以学术论文的方式论及丁玲编辑思想及个性的是解放区文学研究专家刘增杰，他着重对丁玲解放区编辑活动的某些侧面进行描述。他认为丁玲的编辑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得到完善的”，“在编辑工作中，丁玲反对无原则的‘大度、宽容’，主张开展原则性的批评”。^[4]在他看来，编辑家丁玲重视作家队伍建设，尤其注目于青年作家的培育，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编辑个性。席间，亦有学者论及丁玲拥有杰出的编辑家和文学教育家之双重身份可资深入研究。2004年，为纪念丁玲一百周年诞辰，娄底师专学报特辟“丁玲与党的报刊编辑工作”笔谈专栏，发表了黎辛、杨桂欣、颜雄等一些当事人和专家学者的文章，集中探讨丁玲编辑活动及编辑思想，一批青年学人的加盟也为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1] 黎辛. 毛泽东与《解放日报》副刊[J]. 新文学史料, 2002(03); 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部的负责人与编辑. 新文学史料, 2000(02); 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J]. 新文学史料, 1994(4); 丁玲, 我的第一个上司[J].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9(02-03);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J]. 纵横, 2002(05); 《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 捎带说点《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读后感[J]. 新文学史料, 1995(04); 丁玲, 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人: 纪念丁玲同志诞辰100周年[J]. 娄底师专学报, 2004(01).

[2] 孙晓娅. 访牛汉先生谈《中国》[J]. 新文学史料, 2002(01).

[3] 白云祥. 作为编辑家的丁玲[J]. 南都学坛, 1995(02); 胡畅萍. 丁玲的文艺副刊编辑思想初探[J]. 编辑学刊, 1998(03); 等等.

[4] 刘增杰. 丁玲与解放区文艺报刊: 一个编辑家的精神遗产[C]//《丁玲与延安》选编小组. 丁玲与延安: 第八次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36-46.

二、本书的研究视角与内在思路

众所周知，一部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以往，对文学生产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作者、作品和读者及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的，而文学期刊、报纸文艺副刊及其创造者（即编辑）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则基本上被忽略了。近年来，学界越来越重视大众传媒对中国现代文学肌理生成的内在深刻影响，将文学期刊、报纸文艺副刊视为整个文学生产的中心环节，而作者的创作及读者的接受活动，则被视为这一中心环节所连接的始端和终端。期刊（副刊）编辑由于其活动连接着出版、印刷、发行等其他环节，编辑行为最充分地体现出文学话语的两面性质，它既是对原稿的欣赏、理解和阐释，又是对文本的再编码，甚至还规划着发行的策略和方法。毫无疑问，编辑活动既是一种审美活动，也是一种物质生产和社会活动；编辑既是权力话语的使用者，也是权力话语的生产者。对此，有研究者认为：“要全面真实地理解现代文学，了解现代编辑则是一条途径。熟悉他们的文化观、美学观和艺术观，乃至成长背景、学习经历、社会交往等都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必然性、多样性与确定性的思想和艺术形态都可以从编辑这个侧面得到一定的解释和说明。”^[1]

笔者由此得到启发，即不妨关注作为作家、革命文艺领导的丁玲长期被遮蔽的另一面、另一种身份——作为文学编辑（即“把关人”）的丁玲。其理由如下：

首先，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强烈主体意识的重要作家，丁玲一生的文学活动客观上除了紧张的文学创作，还交织着六十年风雨编辑生涯。1980年1月，76岁的丁玲在《我的自传》中如是概括自我人生履历：“我一生当过编辑，编辑过党报副刊、文艺杂志、基层单位的黑板报、墙报、油印的小报；领导过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也当过生产队的扫盲教员，……一九三六年冬，担任苏区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主席，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但我主要的工作是写文章，是一个写书匠，或者叫作家。”^[2]可见，一生所经历过的“作家”“编辑”“党的文艺领导人”这三种社会角色中，“编辑”或许是丁玲本人认同、首肯的仅次于“作家”的职业了：从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和胡也频、沈从文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同人文学杂志《红黑》

[1] 王本朝. 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 [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12.

[2] 丁玲. 我的自传 [G] // 丁玲. 丁玲论创作.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74.

月刊开始，到80年代初主编大型文学期刊《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丁玲主编或参与编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期刊和报纸文艺副刊，多达十几种；尤其是她30年代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延安时期主持的党报《解放日报·文艺》前102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度执掌的《文艺报》、80年代领衔创办的《中国》，不仅曾在文艺界产生过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也与丁玲的个人荣辱、命运浮沉息息相关。因此，从“文学编辑活动”这一角度切入有助于打通丁玲之内部与外部研究。

其次，从大众传播学角度看，文学编辑就是“把关人”。现代文学生产体系中，编辑具有主体性同时又具有中介性，其在组稿、编稿的过程中对编辑方针、宗旨、主题的确定表现出“把关人”身份所赋予的话语掌控权。根据福柯的看法，话语即权力，对稿件、作者的选择，版式设计，编者按或编辑人语的撰写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编辑的权力。然而，编辑的这种权力又是受特定历史阶段外界各种复杂因素制衡的。受党派、人际关系、文化资本运作的影响，编辑的能动性是有限的，主体意识也是受限制的，因此主编的话语权就不得不在意识形态规范、现实人际纠葛、自我主体精神诉求的间隙中行走，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缝合的路径。正因如此，笔者认为从编辑身份这一角度出发，有助于立体地考量具有复合文化身份（作者/编者/革命者）的丁玲，在现代文学生产过程中“自我”（组织者）与作品生产者（作者）、大众消费者（读者）、意识形态规训者（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形态，从而看清在错综复杂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生存空间中丁玲个性化的生存智慧，她悲剧性的抗争，她的伟大与局限。

本书之所以选择《红黑》月刊、《北斗》《解放日报·文艺》《文艺报》和《中国》来考察丁玲一生的文学编辑活动，原因有二。第一，20世纪20至80年代，这五种副刊、杂志恰恰正是丁玲人生道路及艺术创作发生重大转折时期参与编辑或主编的。第二，影响重大、深远。一方面这些副刊、杂志，如《北斗》《解放日报·文艺》《文艺报》，建构了中国左翼机关党报党刊发展史上几次关键的转折；另一方面，它们或者真实反映了丁玲不同时期的思想状况，或者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丁玲个人命运及其艺术个性发生重大改变。通过逐一进行个案分析，笔者试图在对丁玲这一复杂丰富的生命个体产生更多“了解之同情”的同时，也借此挖掘丁玲个体生命更令人回味的思想侧面。作为党报党刊的“奠基人”之一，虽然长期担任党报党刊主编，发挥着意识形态机关刊物的“把关人”职能，丁玲却一直渴望编辑自主性强的文学同人刊物。由此可见，丁玲本人在文学编辑活动中与政治意识形

态控制下的文化体制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冲突中逢迎、逢迎中冲突的暧昧状态，对二者纠缠状态的针对性研究将是本书重要的使命之一。具体而言，在本书中笔者竭力想回答的问题主要包括：

1. 丁玲如何编辑这五种副刊杂志，哪些具体力量或因素参与塑造了丁玲所编副刊杂志。
2. 作为“把关人”的编辑丁玲与组织、大众读者、同时代知识分子（作者）交往行为中的话语策略、情绪逻辑具体怎样。
3. 丁玲的文学编辑活动与其创作实践有何关系。
4. 丁玲所主编或参编的五大副刊杂志的共性与个性何在，不同阶段的文学编辑活动有何异同，其原因何在。如何从整体形态上把握丁玲的编辑思想。
5. 作为体制内一度重要的文艺工作指导者，丁玲的文学编辑实践与体制文化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复杂关系，有哪些重叠又有哪些差异。

探究丁玲文学编辑活动及其编辑思想、个性的形成，其实就是探究其得以成形的历史过程。正因如此，我认为对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的研究应该在总体上采取一种建构主义视角而非本质主义视角，即不是先验的想象的，而是考量特定时空范围内参与到丁玲文学编辑活动中的各种特定文学力量的综合作用。因此，首先要采取顺势研究的方法，即按时间顺序对丁玲所编的五种副刊杂志分别做个案研究，再辅之以回忆性资料的阅读，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文化情境，围绕编辑话语权考察丁玲与不同向度的力量之间的交往行为，考察彼此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同时又要将属于丁玲自己的东西从偌大芜杂的背景中抽离出来，整合起来，直至提炼出丁玲的独异性。

但问题在于：历史研究或文学史研究真能达到客观还原或本真还原的境地吗？更可诘问的是：难道真有所谓“客观”与“本真”？依仗那支离破碎的历史细节我真的能贴近历史的真实，对丁玲一生的文学编辑活动及其编辑思想个性生成史作出全景式的完整描绘？或许那只是自我想象中的“历史真相”？然而，这也正是学术研究工作的魅力所在。因为对“历史真相”的敬畏，“我”的作用被凸显出来。在笔者看来，其文学编辑活动表明：在丁玲与意识形态之间，意识形态（包括大众文化）通过对丁玲赋予编辑一职完成了对她的“利用—规训—惩罚—再利用”的过程，而丁玲一直没有放弃借助编辑“岗位”，为革命知识分子在合法性前提下言说自我寻找缝隙与可能……

第 一 章

坚守《红黑》：
在边缘处唱自己的歌

——丁玲 20 世纪 20 年代文学编辑活动



对丁玲而言，和主编 20 世纪 30—50 年代意识形态核心机关文艺期刊、副刊长达二十年的光辉岁月相比，1928—1929 年与胡也频、沈从文合编《中央日报》《红与黑》文艺副刊、文学月刊《红黑》及《人间》的短暂经历，或许只是一段“几个又穷又傻的人，不愿受利欲熏心的商人的侮辱，节衣缩食想要改造这种唯利是图社会所进行的共同的冒险”^[1]的青涩回忆，丁玲也一再强调“那时编辑《红黑》杂志，主要是也频做事，我只在‘人间书店’办的《人间》月刊上挂一个空名；另外的事则由沈从文和那位书店的老板兼编辑程某负责……”^[2]，然而，假如把她 20 年代参与编辑同人文学刊物的活动放到晚清以来大众传媒与中国文学场话语权变迁的历史背景、置于丁玲整个六十年文学编辑生涯加以观照，则颇多耐人寻味之处。一直以来，对如何看待体制内同人刊物的地位及作用问题，资深党报党刊主编丁玲始终态度宽容。1979 年刚刚复出后的丁玲在第三次文代会上首度公开发言就大声疾呼：“几个人在一块，趣味相投一点，搞一个同人刊物，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将来我们要开放一点……，这样办刊物可以自由一点，大家各有特色，这不算宗派主义。这不能算！……”^[3] 1985 年丁玲坚持以“民办公助”的方式运作大型文学杂志《中国》的设想就离不开早期编辑同人文学期刊《红黑》《人间》的经验。饮水思源，本章中，通过分析《红与黑》文艺副刊、《红黑》月刊在五四后期文学权力场中的话语策略，副刊杂志的商业运作、内在承继关系及同人刊物聚散的过程和原因，全面考察了丁玲文学编辑生涯起步阶段在文艺副刊、期刊及图书出版等方面的编辑活动及个性。

[1] 凌宇. 沈从文传 [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244.

[2] 庄钟庆, 孙立川. 丁玲同志答问录 [J]. 新文学史料, 1991 (03): 77.

[3] 丁玲. 讲一点心里话 [G] // 张炯, 蒋祖林, 王中忱. 丁玲全集: 第八卷.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75.

第一节 副刊杂志与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新文学权力场的构成

晚清以来，西方的入侵加剧了中国的危机，中国知识分子深感于报章乃“传播文明之利器”，以副刊、杂志为阵地，传播西学，开发民智，提出各自对民族危机的解决方案；到 20 世纪初，中国迎来了“新学书报最风行的时代”^[1]，仅上海一地，在 1901—1911 年间，日报和中文期刊的总数即在 100 种以上，其中民营报刊占据 90%。^[2]至清末民初，中国报界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3]由于文学副刊刊载小说、散文、诗歌，其多元的文化趣味能满足不同读者的消费需要，商业性报纸可借此作为报业竞争的一种手段，而代表学会、团体或政党立场的机关刊物则可以来配合政治宣传。登载文学作品能吸引更多读者，扩大报纸销量，文学副刊由此得以蓬勃发展，并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民初名噪一时的“四大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京报·京报副刊》《晨报·晨报副刊》都有复杂的政党背景，^[4]但它们发行面广、出版迅速，和《新青年》《新潮》以及 20 年代前期的 400 多种报刊一道，积极拓展新文学可能性话语空间，组成了新文学传播的强大阵容，成为孕育现代中国文学最初的沃土。

现代杂志在中国的出现，也彻底冲击了整个中国文化结构。不论它是否真正走向了民间，它至少标志着传统文人由结社自娱转向现代公众展示，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那种自娱自乐、分发好友的印刷文化逐渐公共化，并进入消费市场，这也标志着文人生态的转变和新的文学空间的诞生。不同的出版机关周围生活着不同的文人集团，同人书店的出现就是一个标志：印刷传媒和读者大众的兴起，促使

[1] 胡道静. 上海的日报 [M] // 杨光辉, 熊尚厚, 吕良海, 等.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6: 280.

[2] 方平. 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 [J].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01 年 2 月号.

[3] 五四以来形成的机关刊物、同人刊物、商业刊物中，编辑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作用、职能、与读者作者的关系、话语权力的大小强弱不同。一般而言，机关刊物中编辑的主体意识表现为如何尽可能地弱化自我意识，而成为政党的“喉舌”；商业刊物编辑受制于资本及消费市场，更强调一种商业经营思维；同人刊物编辑的主体意识最强。参见陈平原.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M] // 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 188.

[4] 《民国日报》是政学系把持的刊物，《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皆为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掌控。